

日前,记者采访了时任空军34师师长时念堂,他从空军设立“专机”部队开始,就给领导人开飞机,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陈毅等中央领导都坐过他开的飞机。采访中,时老回忆了给中央领导开专机那些年的一些事。

空军34师前师长时念堂回忆 给中央领导开专机的岁月



机组人员与毛泽东等国家领导人合影。



国家领导人在专机前。

新中国第一批飞行员

我属于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飞行员。那时候还不是苏联教员,而是日本教员。那些日本教员都是关东军战俘,经过我们的教育愿意留下来。

我们学飞行时飞的是日本教练机——日本战败后剩下的破烂“99高练”。为什么说是破烂呢?我记得日本教员带着我飞一个小转弯,不要小看这么一个小转弯,造成的离心力很大,对飞机算是一种“考验”,第一回落地之后,中国教员把日本教员狠狠骂了一顿。因为这批教练机都是破破烂烂的飞机凑起来的,飞这种“花样”的动作很容易解体。当时中国飞行员数量极少,很金贵啊。

我1950年10月毕业,11月到长春集合。1951年1月,中国空军购买并改装了42架苏联的“伊尔-12”高空运输机。从此我就开始飞“伊尔-12”。购买这批飞机主要是为了支援18军和平解放西藏。当时进藏部队所有的物资都靠空运,咱们的部队走到哪里,飞机就空投到哪里。

1955年5月1日我回到北京,任“独三团”二大队大队长。那时,飞机有不少,但是比较杂。我记得有“安-2”、“安-45”这种小飞机,也有“里-2”这种中型运输机。“里-2”是咱们国家最早的专机,后来,使用“伊尔-24”当过专机,之后就是“伊尔-18”,后来又增加了直升机。1963年,空34师成立,下辖3个团(100团、101团、102团),当时我是100团团长,专机主要都在100团。

毛泽东请吃狗肉

毛泽东最早坐过“里-2”,我是副机长。后来,有了“伊尔-24”,毛泽东也坐过。1958年以后,毛泽东改坐专机。1959年开郑州会议时,毛泽东在专机上,请我和空34师师长胡萍吃了一顿狗肉。不过,其实我们没见到主席,是汪东兴作陪,但名义是主席请我们吃的。

林彪没有坐过我的飞机,他坐的“子爵号”是从英国买的,四台发动机,能坐50来人。这种英国飞机,人家早就淘汰了,因为航程短、容纳的人少,从商务角度来讲不赚钱。英国卖给巴基斯坦,咱们觉得这个飞机发动机在后面,噪音比较小,即便航程短,咱们当专机也就够了。

周恩来最爱吃四喜丸子

最常坐飞机的是周恩来。在“文革”之前,周恩来总是坐我开的飞机。1960年四五月份,从苏联进口的第一架大型飞机启用后,赶上周恩来访问印度。他就成为第一个坐中国人自己的专机出国访问的领导人。

周恩来非常亲切,尤其是对我们机组人员。不管多忙,只要是上了飞机,一定会先到机舱跟大家问候一下。他总是说:“你们好,受累了,谢谢。”然后跟大家握握手。到了目的地降落以后,除非有外国人在下面欢迎,要不然他都先到前舱去跟大家告别一下,

“你们辛苦了,谢谢你们,好好休息”。大家都知道周恩来忙,常常在车上、飞机上吃饭,如果是在飞机上吃,那就是我负责给他带饭。在我印象里,周恩来最爱吃四喜丸子。

周恩来经常过来和我们攀谈,问我们飞机飞到哪个机场,天气怎么样,要飞几个小时。然后他就回到机舱里看文件、批文件。总理太忙,太累,有时在飞机上睡一会儿。在距离飞机着陆还有十几分钟的时候,总理总会在飞机上洗漱一下。

刘少奇让“空姐”给王光美当临时秘书

刘少奇当国家主席时,也经常坐飞机,他对我们也很亲切。1965年,刘少奇访问阿富汗、巴基斯坦。之前几天,他把我叫到办公室,亲自给我倒了一杯茶水,然后对我说:“这次访问,阿富汗、巴基斯坦领导人的夫人都有女秘书,王光美同志没有单独的秘书,这样不太好。”刘少奇就和我商量,叫我们服务员就是现在的空姐给她当临时秘书。刘少奇最后笑着问:“你看这个事情行

不行啊?”我说怎么不行,在空中她们照常工作,到了阿富汗、巴基斯坦就叫她们跟首长去。

那一次飞行是刘少奇第一次飞越雪山,他对我说,“飞到高山的时候告诉我,我要看看”,从巴基斯坦走的时候,飞过喜马拉雅山时,他果然到前舱来看风景。机舱前面视线最好,刘少奇就坐在机务人员的座位上,一点儿架子都没有。

朱德喜欢在驾驶舱看风景

朱德坐飞机有一个习惯,上了飞机他不喜欢在座位上坐着,而是喜欢和飞行员一起在驾驶舱坐着看风景。起飞他不离开,落地时也不离开。我们飞到大别山上空,天气特别好,他就开始给我们讲战斗故事。

陈毅是个爽快人,跟机组人员也是嘻嘻

哈哈,起外号、开个玩笑是常有的事儿。有时候他还邀请我们吃饭,饭桌上给我们介绍,“这是我老婆,这是我小女儿。”陈老总爱吃红烧肉,他夫人却不让他吃,有一次夫人当面用筷子一打,把陈毅夹的肉打掉了,陈老总也不在乎,哈哈一笑就过去了。

“9·13”事件前后

1971年“9·13”事件前,领导派我到阿尔巴尼亚,9月9日晚上才回来,10日我按惯例休息一天,9月11日上午开了总结会。因为快要过国庆节了,林彪在北戴河休养,随时可能回京,所以我们都做好飞的准备。12日是礼拜天,放假了,到了12日的晚上就出事了。

吴法宪电话打到我这里,询问“三叉戟为什么到了山海关”,我说我刚从国外回来不知道这个情况。吴法宪说“你当师长怎么什么也不知道”,还批评了我一顿,我硬着头皮回答:“我确实不知道,我不会跟司令员说假话。”挂了电话,我第一时间拨通了胡萍的电话询问,胡萍说:“你告诉吴司令,飞机正常训练。”我就信以为真了。十几分钟

后,我接到通知叫我赶快去指挥塔,我急急忙忙赶过去,一进去,吴法宪又把我批评一顿。“飞机走了你都不知道?”我说我确实不知道。

我个人也有一些错误。那天传达命令,两点半以后禁航。得到命令后,我就要去传达,一出门就碰到胡萍,胡萍是老师长,又是空军副参谋长,我就先给他报告。他听了我的汇报后脸特别难看,一点儿表情都没有。随后,我拿起电话给作战科下命令,并告诉他们向沙河机场那边传达。作战科问南苑机场和西郊机场呢?我说我亲自传达。我本人就在西郊机场,我一说不就传达了嘛?可是南苑机场那边我一忙给忘了,结果有一架直升机跑了。

被关了11年,生活待遇还不错

“9·13”事件后,专案组的人就把我关起来了,让我一遍一遍地交代那些问题。不过,我还是干部待遇,住在疗养院,条件也挺好的。一人一间房,伙食是两素一荤一汤加主食,门口24小时都有站岗的,就这样关了7年。

1978年,我又被转到山西劳改农场,那里专门有一个厨师给我做饭,那些管教干部也没有把我当犯人。我现在想,关起来也未必是坏事,等于把我保护起来了,也没有受到虐待,直到1982年我才被释放回家。

(据《文史参考》)

名人往事

朱总司令为电影配音

1951年国庆节的阅兵总指挥是聂荣臻。当时,北京电影制片厂要拍摄一部名为《一九五一国庆节》的新闻电影纪录片,聂荣臻非常关心这部片子的拍摄,每次受阅部队彩排预演,都通知摄制组去观看,以便正式检阅时拍好影片。

影片素材拍下来后,初编样片刚剪接好,聂荣臻就通知导演把样片送审。到南海紫光阁审片的首长除了聂荣臻外,还有朱德总司令、陈毅和陈赓。放映后,首长都称赞今年的大阅兵拍得好,有气势,受阅部队士气旺盛,队列整齐,英姿勃发。

聂荣臻关切地问导演:“还有什么问题吗?”

导演有点为难地说:“现在的问题是,影片中朱总司令阅兵,只有喊口号的口型,没有声音。”陈毅点点头:“我也发现了这问题。”

聂荣臻略想了想,说:“不对,那天朱总司令阅兵,不是专门批了一辆吉普车在检阅车前边,供摄影和录音用吗?怎么会没有声音呢?”

导演回答:“声音是有的,但不能用。声音太杂,汽车的马达声都录进去了,听不清。”

“那怎么办?”聂荣臻和婉地问。

导演犹豫地说:“我们想请朱总司令重录一下,而后配上去。”

陈赓听了,说:“让总司令到你们厂里去录音,可是不妥当啊。”

那时的录音机很笨重,光用汽车上的那种电瓶就得好几个。导演表示:“我们可以把录音机拉到中南海来录。”

朱总司令爽快地说:“行,你们给我约个时间就可以了。”不久,朱总司令在紫光阁给摄制组录音。现场除了摄制人员外,陈毅和康克清、李伯钊两位大姐也在场。朱总司令坐在沙发里和蔼地问:“我喊什么口号?”

导演说:“您就喊国庆节那天阅兵时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祝同志们健康!”

录音师把麦克风摆好了,朱总司令站了起来,规规矩矩地刚喊了句“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坐在一旁的康克清和李伯钊两位大姐都咯咯地笑了起来。朱总司令扭头问导演:“她们笑不行吧?笑声都录进去了吧?”

陈毅笑着说:“走,我们找个地方,不让她们看。”

陈毅到北京参加政协会议,可以下榻北京饭店。这可是当年最豪华的饭店。陈毅却把房间让给了北平起义的傅作义将军,自己搬到中南海陈旧的平房里住。于是,朱总司令、摄制组随陈毅到紫光阁大厅后边一个小房间里重新录音。

朱总司令听从导演的摆布,非常认真地站在麦克风前,一口气连喊了三遍“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祝同志们健康!”喊完,他慈祥而认真地地问:“导演同志,怎么样?行不行?”

摄制组同志被朱总司令这种一丝不苟的精神感动得热泪盈眶。导演忙说:“行行,很好,很好!朱总司令,陈老总,你们坐下来休息吧!”

后来,摄制组把朱总司令喊的这两句口号以及电影厂组织受阅部队官兵重录的“万岁!万岁!万岁!”“朱总司令健康!”一起配在影片上,声音既洪亮又清晰,大大增强了纪录片《一九五一国庆节》的艺术魅力。

(据《文史月刊》)

燕莎·裕隆·银座
周大生珠宝
CHOW TAI SENG
因爱而美 为爱而生
燕莎·广场·新春
老凤祥珠宝
——1848——
首届奥斯卡百年老凤祥

燕莎购物广场
千禧之星珠宝
千禧信缘 钻石承诺
燕莎购物广场
六福珠宝
听·心·动·魔·动·听